

• 王雲五主編 •

人人文庫



赫胥黎自由教育論

赫 胥 黎 著
本館編審部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017326

G 40

8826



S9002415

赫胥黎著
本館編審部譯

赫胥黎自由教育論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復刊人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自民國五十五年始刊，迄六十二年終刊成者計達一千五百餘種。中分單號雙號及特號三種。單號每冊八元，雙號十二元，特號二十元。其種數之多，定價之廉，冠於全國。及六十二年秋後，紙張價格奇漲，且不易得，其他工料莫不稱是。人人文庫原以廉價爲主，隨成本而增價，殊違本旨，不得已於六十三年元月始暫停新書之印行，即原已出版各書亦以售罄爲止，暫不重版。今歲三四月以來紙價工價雖平均較前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然已漸趨穩定，籌謀再四，決從五月起，仍予復刊，每月新刊暫定爲十種，其原出各書，銷數較廣者，仍予重版，以應讀者需求。書價姑定爲單號每冊十二元，雙號十八元，特號三十元，所增雖僅百分之五十，而以視工料之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者，仍稍虧損在所不惜。

復刊以後，選材益加審慎，範圍亦日廣，除與英國之人人文庫比擬，且後來居上。關於新知識之介紹仍略仿英國家庭大學叢書。又復刊新書之編著悉與原刊蟬聯

，設印刷工料不再增長，則由原刊之千五百餘種，不難與時並進，遞增至數千種，乃至萬種，使青年學子得以廉價盡讀有用之書，此則所殷望也。

又除單號雙號每種仍維持一冊外，特號因多載名著，爲存其真，必要時得分訂爲二冊以上，如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卽其一例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

譯者弁言

這赫胥黎不是寫天演論與倫理的赫胥黎；那是湯麥士赫胥黎 (Thomas Huxley)，而這是阿爾杜絲赫胥黎 (Aldous Huxley)；不過兩人有很密切的關係，一是祖父，一是孫子。老赫胥黎也寫過一篇關於教育的文章，叫自由教育 (Liberal Education)，也可以譯爲通達教育，(註一)現在輯入他的八大本的集子裏；在大學英文讀本裏時常也選輯到它。如今這位文孫關於教育的討論在原則上始終是繩其祖武，不過因爲時代不同，環境迥異，有許多對症發藥的話，在老赫胥黎是想不到而無從說起的。我如今把它逐譯出來，一方面爲的是可以重申自由教育或通達教育的原則的必要，另一方面認爲其中對症發藥的話也正復是我們目前所亟切需要的。我們對於西洋式的教育，亦步亦趨了四五十年，晚近對於西洋教育的某幾個方面，更有青出於藍冰寒於水的趨勢；西洋人自評其一部分的教育爲『鵝步教育』，然則我們學步邯鄲，豈不更成爲鵝步的鵝步？這種教育，即使教王右軍復生，也不見得會引爲躊躇滿志，則赫氏這一番討論自值得我們特別的措意。赫氏於一九三七年著一書問世，叫目的與手段 (The Means and the Ends)，全書十五章，對於近代西洋文明的各方面，都有很精到的觀察與評價；本文就是書中的第十二章，題目就是教育。

書中（註一）自由、通達、中庸一類的概念是名異實同的一回事，見譯者所寫散漫、放縱、與『自由』一稿，昆明大國民報週刊，第二十六期，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註二）自由、通達、中庸一類的概念是名異實同的一回事，見譯者所寫散漫、放縱、與『自由』一稿，昆明大國民報週刊，第二十六期，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目次

譯者弁言

一	緒語	一
二	童年後期的教育	六
三	政與教的南轅北轍	一二
四	體育競賽與品格教育	一七
五	非愚即妄的知識教育	二二
六	人的同異與教育的同異	二六
七	兩種教育的失敗	三一
八	說不通與似通非通	三六
九	說通	四〇
十	通達教育的實驗	四五
十一	音樂戲劇與教育	五〇
十二	說文學與教育	五五

十三	再說文學與教育·····	六〇
十四	智慧的自由·····	六四
十五	自求多福·····	六九
十六	開口與不開口的宣傳·····	七四
十七	說解析的技術·····	七九
十八	身體的教育·····	八三

自由教育論

一 緒語

近代從事於教育的專家以及一部分的心理學家，有一個通病，就是對於兒童時期的訓練，以及幼年的特殊遭際，過分的重視，認為對於一個人的後期生活，有極大的命定的力量。（註一）以前天主教的耶穌會的人士時常自誇說，只要把任何不夠大的小孩子交給他們，他們可以教他成甚麼就甚麼。同樣的，近代精神分析派心理學家認為人類精神生活的許多毛病全都是早年不良的遭際所造成的。不過，話雖如此說，耶穌會中所訓練出來的人裏，除了善男信女外，一樣的有自由思想家（註二）和革命家。而許多的心理學家最近對於精神分析派的主張也逐漸的掉頭不顧。精神分析派中人自己，如容格（Jung），也說，「根據了早年精神受創之說來實行心理治療，往往是極危險的，因為被治的人勢不得不就好幾十年的經驗裏，用追憶的方法，竭力爬梳鉤檢，結果所得，也許祇是一個假想的因緣，而對於目前極關緊要的事物遭遇，反而置諸腦後，漠不關心」。這話是很對的。以情理論之，人生原是多方面的影響所形成的，已往的境遇是一方面，目前的境遇，以至於未來想像得到的境遇，又何嘗不是？幼年的境遇雖有它的左右

的力量，但決不能完全命定一個人的前途，即使其間有一部分決定的力量，青年與成年的種種境遇也正復可以把已經左右的重新左右一番，已經決定的加以否定，而重新加以決定。從一個人的本身來說，他的意志，在相當限度以內，也不能不說是自由的，只要他能夠運用他的意志，而知所抉擇，他也可以自動的加以重新決定。重新決定的結果有好的，也有壞的，例如，在英美等國，幼稚教育的決定的力量，大體說來是極好的。但幼稚教育以上的各級教育就不行了。無論耶穌會士和精神分析派的人說些甚麼，我們知道，幼年期的良好決定力量，到了青年期，依然可以被不良的決定力量抵銷。韋爾斯 (E. G. Wells) 在他的挫折的解剖 (Anatomy of Frustration) 一部小說裏，借了書中主角的口氣，評論到幼童和青年兩時期的精神生活的異樣，『一個六七歲的幼童是何等的可愛，何等的聰明靈快，何等的活潑自由，無所畏懼，而一到十六七歲以後，又是何等的消沉板執，呆若木雞』，看去能不教人傷心？前者是幼稚教育的產物，而後者是初中兩等教育的結果。我們教幼童的是自由、靈敏、責任心、和自動的人我合作；而教較長的兒童的却是如何死心塌地的承受傳統與環境中的一切，爲的是前途不是可以統治別人，就是可以受別人統治。西洋民主政治國家沒有把目標弄清楚，沒有把發展的途徑把握住，這種教育上的矛盾就是一個症象了。舊的父權的傳統，和新的自由主義的民主觀念，同時在我們心目中存在着，不斷的在那裏發生齟齬。我們要自由，要民主，所以根據自動與自治的道理訓練幼童，及訓練成功，我們忽然想起了我們的社會還是有朋黨、分級層、講特權的，而

有時候仍須作不少的威福的，於是又着急起來，於是不得不用全力來改變教育的方向，就是一方面教他們成爲統治的人物，一方面成爲可以任人擺佈的被治階級。

在這裏我們不妨提一筆，所謂『近代』的學校教育也許是過分的『近代』了，而所過的分量是一半。何以言之呢？在這種教育裏我們可能有一個危險，就是把自由給得太多，多到一個兒童不知如何運用的程度，同時把責任也給得太多，多到一個兒童無法準備知道如何擔當的程度。太多的自由與太多的責任對於他們都是一種重擔子，不是根本挑不起，便是弄得疲憊不堪，除了少數極端的例子不說外，兒童大都喜歡安全，喜歡一個道德的規律與行爲準則所形成的——一個機架來支持他們。在這樣一個穩定的機架之內，我們依然有不少的餘地，來訓練他們成爲獨立、負責、與能合作的人。總之，重要之點是在避免任何極端——自由不宜太多，負責不宜過重，同時限制也不宜過嚴，不適當的限制自更不宜過於繁密。因爲這所謂穩定的機架，或一套生活的規範，可能是健全的，也可能是不健全的。例如說生活的安全，一套不依附而超脫的道德規律可以給我們，而一套軍國主義的道德規律也未嘗不可以。但在兩種規範之下所教養出來的結果會有很大的區別。

回看目前實際而我們所認識的世界，我們有一個重要問題不能不問。即使我們把目前實施幼稚教育的原則，例如自治、負責、合作等等，延展下去，一直進到青年時代，我們對於受教育的人，於其立身處世之道，是不是真能夠得到一些顯著的改進呢？我很懷疑。實際的生活畢

竟是最有效率的教師。把習於自治與合作的青年，一旦放進一個有級層的、講究競爭的、而崇拜名利的社會，而任其亂闖，試問會發生甚麼一種結果。早年在學校裏所接受的決定力量會維持於不敗麼？我看不會。最可能發生的是：這些人加入社會以後，總有一個時期的莫明其妙與不知所措；然後，有大多數的分子又慢慢的安定下來，算是找到了他們的新的作育。這又無非證明，生命是囫圇而不可分的，而局部的改革並不能產生任何預期的效果。除非我們對於別的部分，同時也費上一些改革的功夫。

我在上文暗示到過，良好的教育固然重要，但它並不是一服萬應的靈丹，可以救治任何疾病的。有的蒿目時艱關心國是的熱心人如此想，我却無此奢望。不過在有一個條件之下，它可能成爲這服靈藥，就是生活的別的部門必須同樣的良好，而能和它通力合作，否則還是徒然的。照例的，這其間的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因果問題，而是一個複雜的相互關係的問題，一個動作與反應的問題。一方面要有了良好的社會狀態，一方面在個人中間，要有了良好的信仰與見解，良好的教育才能發生效力；而除非教育良好，社會狀態與個人的觀感也不會良好到甚麼地步。所以，社會改造的問題是怎樣衝破這樣一個惡性的連環，而另外綴成一個善性的連環的問題。

（註一）以前中國也有同樣的看法說法，例如：三歲定八十，七歲定終身。

（註二）自由思想與思想自由是兩事。自由思想家是在思想上不接受任何繩墨的，主張思想自由的人至少接受事實

的細墨，經驗的細墨，情理的細墨等。|英文中也作同樣的分別，前者是 free thought，後者是 freedom in thought。

二 童年後期的教育

我們在上文說到良好的教育，究竟良好的教育是甚麼，我們如今必須探討一下。嬰兒出世後的幾個月以至於兩三年以內，主要的教育是生理的，講得更淺近一些，就是關於糞便一類的排洩作用的。在以前，誰都認為這是一個很小的節目，不登大雅之堂的勾當，是犯不着討論的。不過近代的心理學發見這並不是一件小事，而至少為嬰兒着想，排洩的作用和這方面的善良習慣的養成是和前途的生活有極深刻的關係的。我在這裏只須提到一位心理學家，就是不久以前去世的舍蒂博士 (Dr. Suttie)。

舍蒂博士寫過一本書，叫『愛憎的由來』 (Origins of Love and Hatred)，中間很有趣的一章，專門討論到此種習慣對於一個人情緒生活的影響。就以前的習慣說，這種影響大體上是壞的。書中又舉了不少的理由，說明如果我們另有一套習慣，即如果我們對於清潔的訓練，略微放鬆一些，或開始得比較晚一些，我們的情緒生活便會安閒鎮靜得多。不知清潔為何物的兒童誠然是惹厭；但若在嬰兒期內，我們稍稍任其自然，於其便溺的行爲，不過分的申斥做戒，於清潔的原則，不切心於提撕警覺，這種嬰兒長大以後，在性情上便會比較的溫柔寬厚。遇有不如意事，也不會和別人多爭閒氣。舍蒂博士自認為可以保證這一點，因為這麼的一個人是不

受他所謂『溫良上的禁忌』(taboo on tenderness)所威脅的，而別的人既遭禁忌於前，便不克溫良於後。

關於嬰兒期內的生理教育，這幾句話也就夠了。其次要說的是童年後期的道德與理智的教育。德育與智育當然是分不開的；(註一)但爲討論方便起見，我們不妨分一個先後。究竟甚麼才是一個良好的道德教育呢？我們在上文已經提到過，此種教育的目的是在培養自由、公道、和平一類的美德。怎樣的培養呢？羅素，在他近期的那本那一條和平之路？(Which Way to Peace)裏，在這題目上有過一節很有意義的話。他說，『一百年來，教育已經有很大的普遍的進步——至少在維持民主政治的各個國家裏，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在實行軍事獨裁的國家，包括俄國在內，在已往的十多年以內，教育是大大的退步了，這種退步包括四點：一是嚴格的紀律的恢復；二是絕對而不問情由的服從；三是對教師的唯命是聽，已到一個可笑的程度；四是在知識方面消極的接受灌輸，而不是積極的自求啓發。在政府的眼光看來，認爲如果沒有這些，便不足以養成一種軍國民的頭腦，而所謂軍國民的頭腦，就是，對在上的人要服從，要怯懦，對在下的人不妨擅作威福，而蠻不講理，其對於他國的人，當然也要如此；以一人之身，而兼具這兩種相反的性格，就是所謂軍國民的頭腦了。……從專制的人或獨裁的人所作所爲看來，我們知道他們是和一部分的所謂「近代」教育不謀而合的；這一部分的「近代」教育認爲童年的紀律的訓練和成年的戰爭的愛好有前因後果的關係，所以，我們不講求軍國主義則

己，否則不能沒有嚴格的紀律教育做準備。』

在一本近期的小冊子裏，蒙特梭利博士 (Dr. Maria Montessori) 也發揮過同樣的一層見地。她說，『一個兒童，如果沒有學會獨自一個人行動，自主的控制它的作爲，自動的管理它的意志，到了成人以後，他不但容易受別人指揮，並且遇事非依賴別人不可。一個學校裏的兒童，如果不斷的受教師干涉、禁止、呵斥、以至於詬罵，結果會變成一種性格上很複雜的可憐蟲，就是一方面對自己的能力不但不認識，並且不信任，一方面對環境發生恐懼；此種內疑外懼的心理，在童年與青年時代我們美其名曰羞縮，而一到成年，便可以成爲頹喪，成爲痿靡不振，成爲逆來順受，而一遇危機，連最低限度的一些骨氣，一些道德的抵抗力，都拿不出來。家庭與學校都唯恐兒童不服從，但因爲此種服從的要求往往既不講情，又不講理，且又違背允諾的原則，所以早年越會服從，則一到成年，對於一切環境中的盲目的勢力越是像綿羊一般的馴擾。近時學校裏又有一種極普通的責罰的方法，就是教育過失的兒童，公開的受團體的譴責，在實施這種方法的「教育家」以爲這就是學生自治，就是團體負責，就是社會制裁，就是以一儆百而不傷於嚴峻的錦囊妙計；殊不知這是最不堪的一種懲罰的方法。誰都不願意做一個明正典刑的對象；真正的一個犯人，到此境地，也許是罪有應得，可以不論；如今我們的對象却是一個尋常的學校兒童，他有得多少知識，懂得多少是非的判斷，而也教它經歷此種磨折，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就是教他從今以後，見了衆人，不敢抬頭，遇有公論，畏如蛇蝎，初不論衆

人對他的態度如何，更不問公論的是非安在。（註二）總之，這一類的設施，在青年身上，第一步是養成一種永久的自卑與自餒的心理，而第二步，也是最後的一步，是教他們對於在上的Condotieri（意大利文稱領袖們）油然而生一種五體投地的精神。』

我以為蒙特梭利博士還不妨添上一句，就是此種自餒的心理倒並不是完全消極的，而是有它的積極的補償的，而其補償的表現就是對於另一部分的人的作威作福，予取予求；消受過上峯的人的威福的人不免用同樣的威福來取償於在下的人，這是理有固然，勢所必至的。西洋傳統的教育本來教人如何在一個階級的社會裏取得安放，即教人對上則阿附取容，而對下則欺凌剝削，如今自獨裁政治上臺以後，此種教育，表面上是花樣翻新，實質上却是舊調重彈，變本加厲，這在明眼人是不會不覺察的。

我們讀了上面的兩段引文，我們就不難了解，為甚麼近代的歷史會走上它確乎已經走着的路，特別是最近幾年的那一段。黷武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變本加厲，獨裁與極權政治的勃興，民主政治的趨於削弱——這些正像歷史上其它事件一樣，自有其種種複雜的因緣。其中最彰明較著的是一些政治與經濟的因緣。不過僅僅政治與經濟的因緣是不足以解釋的。教育與心理的因緣也正復有它們的地位。

在教育與心理的因緣裏，有一個是不能不算進去的，就是，在已往的六七十年中，在國家設立的學校裏，所有的兒童都是在強大的積威之下長大的，在嚴格的紀律之下討過生活的。在